

「文凭社会」下的技职教育再制机制：台湾技职体系中的阶级、象征与文化权力分析

Reproduction Mechanisms of 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Credential Society: An Analysis of Class, Symbolism, and Cultural Power in Taiwan's TVE System

蔡富浚，台北商业大学 & 台北教育大学

摘要

本文从 Randall Collins 的文凭社会理论出发，结合 Bourdieu 的文化资本与教育再制理论，透过次级资料与政策文献分析，批判性检视台湾技职教育体系在当代社会中的制度定位、象征意义与文化权力运作。研究结果指出，尽管政策强调实务导向与产学接轨，技职体系仍难摆脱社会赋予的「次等选项」卷标，并因文凭象征资本的弱势而无法翻转学生阶级位置。学生多数来自中下阶层家庭，其教育选择深受阶级结构与文化资本分配影响，进一步被限制于有限的社会流动机会。此外，技职学校内部在绩效导向制度下的资源分配与教学文化，亦再制主流文化资本与社会价值，削弱其教育正义功能。学生对自我教育身分的认同困境与未来预期的焦虑，亦成为技职体系内隐性再制机制的一环。本文呼吁未来技职政策需从象征与结构两层面进行转向，重构技职教育的社会价值与多元流动信道，以实现教育公平与社会正义。

Abstract

This study adopts Randall Collins' credential society theory and Bourdieu's cultural capital and reproduction theory to critically examine Taiwan's 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TVE) system. Drawing from secondary data and policy documents, the research explores how the institutional positioning and symbolic power of the TVE system contribute to the reproduction of social inequality. Despite policy efforts emphasizing practical training and industry-academia cooperation, vocational diplomas remain symbolically inferior to academic degrees, rendering TVE students—mostly from lower socioeconomic backgrounds—structurally disadvantaged in their pursuit of upward mobility. The study also reveals how performance-driven evaluation and internal resource allocation within vocational schools reinforce dominant cultural values and undermine support for underprivileged students. As a result, students internalize negative identities and experience uncertainty about their educational pathways and career prospect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meaningful reform must address both the symbolic and institutional dimensions of TVE to rebuild its legitimacy and foster genuine opportunities for social mobility and educational justice.

关键词：技职教育；文凭社会理论；文化资本；阶级再制

Keywords: 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Credential Society Theory; Cultural Capital; Class Reproduction

一、引言

在现代知识型与文凭导向社会中，教育体制不仅担负着知识传递与技能养成的任务，更深刻地参与了社会阶层的划分与再制（Collins, 1979）。尤其在高度竞争与资本主义深化的台湾社会，技术型与职业导向的教育体系（以下简称技职教育）往往被定位为次于普通学术教育的选择，其制度安排与社会认知长期受限于阶级、文化资本与象征权力的多重结构（黄骏, 2001）。本文以 Randall Collins 所提出之「文凭社会理论」（Credential Society Theory）为核心视角，透视台湾技职教育发展与社会再制间的关联，并透过次级文献分析法探究技职体系如何在政策、制度与文化层面中运作，进而强化或挑战社会不平等结构。

Collins（1979）主张，当代社会已成为「文凭社会」，即教育资格（如文凭、证照）成为进入就业市场与社会阶层的重要门坎，而非能力本身。教育制度日益转变为筛选与排序社会成员的工具，文凭作为象征资本，扮演社会正当化阶级分化的角色。这样的理论视角，有别于传统以功能主义为基础的教育观点，亦提供当前检视台湾技职教育制度性不平等的有力分析工具。

过去台湾教育体系历经多次改革，从升学主义压力下的升学导向社会，逐渐扩张技职教育体系以响应产业需求。然而，在扩张与改革的过程中，技职体系始终未能摆脱「次等教育」的标签（黄松浪, 2013）。许多研究指出，技职教育学生多数来自中下阶层家庭，社经地位显著低于普通高中体系，教育选择受限于结构性条件与社会预期（Shavit & Müller, 2000；李隆盛, 李懿芳和张维容, 2020）。此外，技职体系的文凭价值亦在社会中被相对贬抑，使得技职学生即便拥有专业技能，仍难以获得等同社会认可与职业报酬。

台湾政府虽于近十余年推动包括「技职再造计划」、「产学携手合作」、「技高课纲革新」等政策，企图提升技职教育质量与社会形象，但这些改革是否真能松动长期以来的阶级再制结构，仍需透过更深层的结构性分析。尤其当前社会仍强调「学历」作为社会流动与职场进入的重要资本，技职教育尽管在实作训练上具优势，却仍无法摆脱象征性弱势地位。

在此脉络下，Collins 的文凭社会理论不仅有助于揭示教育制度如何作为阶级再制的机制，也能进一步说明技职教育如何在制度安排、象征秩序与行动者认知中运作。其强调教育并非纯粹中立的知识传递机制，而是透过文凭与教育历程来合法化既有的社会阶层结构。这样的视角，亦响应了 Bourdieu 与 Passeron（1990）所提出之「文化资本」与「教育再制」理论，指出在教育过程中被隐而不显的象征权力操作。

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讨台湾技职教育是否强化社会阶级再制，及其在文凭社会下所承载的象征意义与组织运作逻辑。具体研究问题如下：

1. 台湾技职教育制度如何体现 Collins 所指的「文凭社会」现象？
2. 技职体系是否成为阶层再制的管道？其制度设计与社会认知如何运作？
3. 技职学校内部的组织政治与文化资本如何影响学生身分与学习路径？
4. 技职体系学生如何理解自身的教育选择、社会位置与未来流动性？

有鉴于台湾技职教育的制度建构与社会认知并非单一时间点的结果，而是在政策文本、法规条文、评鉴指标与官方报告等长期互动中逐步沉淀与再生产，本文采用文献分析法（document analysis）以处理其历时性与制度性特质（Bowen, 2009）。此方法能从政策语言与制度设计的脉络化阅读中，辨识权力关系如何被正当化、文凭象征如何内嵌于评鉴与资源分配，以及分流制度如何被日常化为理所当然的选择结构；换言之，文献分析法特别有助于揭露那些难以以横断式问卷或个案访谈直接观察到的隐性结构问题与象征秩序，从而响应本文以文凭社会与文化资本视角检视技职再制机制的理论关怀。

本研究期望透过理论与实证资料的交织，提出一个具批判性与建构性的解释架构，理解台湾技职教育在文凭社会中的制度角色。此研究不仅补足过去技职教育研究中偏重就业导向与产业适配之局限，也可为当前技职政策提供更具深度的文化与社会分析视角。

二、文献综述

（一）Collins 的文凭社会理论（Credential Society Theory）

Collins（1979）在其经典著作《The Credential Society》中提出一个划时代的观点：教育不再仅是传递知识与技能的机构，而是一种社会阶层区分与控制的制度装置。其理论核心主张，文凭不仅是能力的证明，更是一种象征性的社会凭据，具有文化资本的功能，用以界定个体的社会地位与职业机会（Collins, 1979；林宗弘，2009）。

Collins 特别强调「文凭通胀」（credential inflation）现象，指出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原本属少数人掌握的学历资格逐渐失去其排他性价值，从而造成学历贬值与「资格内卷」的状况。职场对学历的要求不断提高，并未反映真实的能力需求变动，而是反映社会阶级稳定化的倾向（Brown, Lauder, & Ashton, 2011）。在此脉络下，教育制度扮演的不再是「能力养成」的角色，而是「社会筛选」与「阶层排序」的场域（黄骏，2001）。

特别是在台湾这类具升学导向文化的社会，Collins 理论对教育结构的批判展现出极高的解释力。高中与高职的分流制度，以及技专与一般大学体系的分野，表面上是能力与志向的选择，实质上却强化了社经阶级的再制结构。教育部近年推动的技职教育再造与课程革新计划虽强调技能导向与职场接轨，但在升学与职涯评价体系不变的情况下，技职体系仍被视为「次等教育」的象征（国家发展委员会，2017；林大森，2002）。

在文凭社会中，文凭的象征性与其认同建构的功能同样不容忽视。Collins（2002）延伸其理论指出，学历本身构成一种象征互动机制，个体被他人评价时，所拥有的文凭会自动触发某种社会定位与能力预设。这也导致了对学历的高度依赖与过度重视，使文凭制度成为形塑阶级文化与社会关系的关键因素。

此观点与 Bourdieu 的文化资本理论形成互补关系。Bourdieu 与 Passeron（1990）认为，教育制度以主流文化为标准进行评价与分配资源，而中产与上阶层子女较易习得这种文化资本，因此在教育竞争中占有优势。Collins 则更进一步关注教育凭证本身作为象征性权力的操作模式，指出其不仅作为文化认可的象征，同时也是制度化的不平等设计（李敦仁，2007）。

若以主题分析法（Thematic Analysis）解析 Collins 理论于本研究的应用，初步可发掘以下三个分析主题（themes）：

1. 制度层次的凭证正当化与阶层稳定逻辑

教育制度透过文凭制度建立正当化机制，合理化社会阶级的维持与职业资格的排他性（Collins, 1979）。意即表面上看起来每个人只要努力读书、考试，就能获得好文凭、进入好工作，但实际上，这个制度早已隐含了筛选与排序的机制。例如，在台湾，升学制度明确地将学生分流到普通高中或技术高中，而后续的升学、就业选择，也往往与学历密切绑定。因此，教育的功能，从原本的培养知识与技能，逐渐转变为一种社会排序与阶层再制的工具。这一点在技职教育体系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即便强调实作与能力，学生仍被以学历价值被定义与评价，导致技职体系长期被视为「升学失利者」的次级选项。

2. 组织运作中的文化资本重现

学校与教育行政组织，在资源分配、评鉴机制与升学策略中，持续强化特定文化资本的价值，

削弱教育的补偿性功能 (Bourdieu & Passeron, 1990)。意即学校看似中立公平, 实际却往往重复再生「主流文化」的价值观与行为模式。这在技职教育中也很常见, 例如政策推动的评鉴、补助资源或是升学与证照比率, 表面上是鼓励表现、追求卓越, 但实际上却强化了本就拥有较多资源与文化资本学生的优势。

3. 个体层次的象征互动与认同建构

学生在文凭导向的教育脉络中, 形塑其自我认同与未来预期, 进而内化社会卷标与阶层位置 (Collins, 2002)。这个面向着重于学生个人的经验与认知, 也就是说, 在整个文凭导向与分流机制下, 学生是如何看待自己的教育选择、未来发展与社会定位。更进一步来说, 当社会普遍认为大学比技职学校好、普通高中比高职高级时, 学生也会内化这种标签与价值观, 影响他们的学习动机与未来期待。例如, 部分学生可能会拼命考转学考、或是参加各类考试希望「翻身」, 不是因为学到了实用技能, 而是希望获得一纸更被社会认可的文凭, 来改善自己的阶层处境。

这三个主题构成本研究后续分析台湾技职教育结构与运作的理论分析框架。透过文献分析法, 本研究将聚焦于政策档、教育年报与实务计划报告的文本语义与制度逻辑, 从而揭示文凭社会下技职体系的阶级运作与象征功能。

(二) 技职教育与台湾社会阶层流动

台湾技职教育制度化自发展以来, 始终在国家政策与社会认知中处于一种矛盾位置。一方面, 技职体系被赋予协助经济发展与培育中阶技术人才的使命; 另一方面, 其制度结构与社会文化意义却长期受到学术体系的边缘化 (黄毅志, 2011; 刘祖华、刘丰瑞, 2022)。这种制度性「次等化」使技职教育逐渐内化为社会阶层分化与再制的机制之一, 对中下阶层学子的阶级流动造成深远影响。

根据教育部历年统计资料, 高职与技专体系的学生大多来自农、工与服务业背景家庭, 其父母学历与家庭收入明显低于就读普通高中的学生群体 (教育部, 2024; 陈美姿、宋修德, 2024)。徐昊杲、林逸栋 (2015) 进一步指出, 在偏乡地区与原住民社群中, 技职体系经常被视为可及性较高的升学选项, 成为社会资源不足学生的「制度性预设选择」。这样的结构安排不仅再现 Bourdieu 与 Passeron 所提出的文化资本差异与教育阶级再制理论, 也呼应 Randall Collins 在《文凭社会》中对教育凭证制度所揭露的阶层排序功能。Collins 指出, 文凭制度本质上是一种「象征性筛选机制」, 其目的在于透过教育资格将社会成员加以分类与阶层化, 并强化职业资格的排他性与阶层稳定。

台湾技职与普通教育体系的制度性落差, 进一步巩固此一结构性不平等。升学分流制度使国中毕业生需在尚未成熟的人格与生涯意识下做出进路选择, 技职体系常成为学业成就较低学生的「被动选项」。即便近年政府推动多元入学方案, 强调适性发展与技艺教育价值, 社会大众普遍仍将升入大学视为成功象征, 导致技职体系持续被视为社会阶层向下的象征性通道 (Shavit & Müller, 2000)。在 Collins 文凭社会理论的视角下, 技职体系所颁授的文凭常被社会解读为次级教育的标志, 进而影响学生未来的就业机会与社会移动潜力。

近年台湾政府虽积极推动技职教育改革, 期望透过制度调整扭转其象征性弱势与功能性贫乏, 然而成效仍属有限。从 2008 年起, 教育部陆续推动「第一期技职再造方案」、「第二期技职教育再造计划」至近年的「产学携手合作计划 2.0」与「技职卓越计划」, 试图强化技职教育与产业需求的连结、改善实作环境与课程内容 (教育部, 2019a)。此外,《技术及职业教育法》自 2015 年起实施, 亦企图透过法律制度提升技职教育的社会地位与制度质量 (教育部, 2024)。

然而, 上述政策多仍着重于实务技能的强化与产学链结的提升, 较少触及文凭社会逻辑下的象征结构问题。例如, 技职体系学生毕业后虽拥有技术能力, 却因其文凭价值不被普遍认可, 仍常遭遇晋升与薪资成长的天花板。此外, 学用落差问题依然严峻, 根据 2017 年国家发展委员会委托报告指出, 多数技专院校科系调整弹性不足、课程内容与业界脱节、教师缺乏实务经验, 导致毕业生能力与职场期待落差甚大 (国家发展委员会, 2017; 李高英, 2017)。

技职教育的阶级转译功能，理应是打破阶层流动限制的重要途径，然而在现实操作中却经常扮演阶层复制的角色，黄铭福、黄毅志（2014）提出台湾社会对技职教育的刻板印象仍深植人心，学生进入技职体系的主观动机多为「考试失利」而非「兴趣导向」或「生涯规划」，进一步削弱其教育正当性与自我认同。Collins 理论指出，教育系统不仅不具平等机会的保障功能，反而因文凭的象征性排序与制度化排除，强化原有阶层位置（Collins, 1979）。台湾技职教育若未能解构其制度性与象征性的双重弱势地位，恐将继续限制中下阶层群体透过教育向上流动的可能性（黄毅志，2011）。

综上所述，技职教育的发展与其在台湾社会阶层流动结构中的角色，值得从更深层的制度与文化面向检视。若无法改变文凭社会对技职体系的负面刻板印象与资源分配不公问题，则即使强化实务训练与产学合作，亦难从根本上提升技职体系作为阶级转译工具的功能。

（三）组织政治与文化资本运作

技职教育体系不仅是传递知识与技能的场域，更是一个充满制度安排与权力角力的象征场域。在 Collins 的文凭社会理论与 Bourdieu 的文化资本理论视角下，学校本身即构成文化再制的核心场域（field），其中的制度规则、资源分配、与价值体系反映并强化既有社会阶层结构（Bourdieu & Passeron, 1990; Collins, 1979）。

首先，技职体系的资源取得与组织运作高度受到外部结构权力的牵引。技职学校在争取补助经费、校外实作场域、升学表现等方面，常进行功利导向的「资源政治」操作，导致绩效指标如竞赛成果、实习合作数量等，取代了教育本质的关怀与社会公平的目标（张训译，2019；陈易芬、翁福元、廖昌珩，2015）。张宜君与林宗弘（2015）也指出，在高等教育大幅扩张的情境下，资源更集中于高筛选性与公立一般大学，而技职体系则沦为竞逐次等资源的边陲体系，导致水平分流与文化资本再制并存的现象。

其次，学校内部行动者的实践行为也会深刻影响文化资本的生成与再制。教师与行政人员对学生的期待、教学方式与升学辅导方向，往往带有阶级偏见。例如部分教师会预设技职学生「只能操作，难以思辨」，导致教学内容限缩为纯技能训练，进而限制学生文化资本的多元性与发展潜力（方志华，2023）。此外，黄政杰（2015）发现中下阶层家庭家长对教育的期待常以「快速就业」、「稳定收入」为目标，较少关注学术或文化资产的长期培育，使学生从家庭端即缺乏象征性文化资本的灌注。

这些文化资本的结构缺乏，经常转化为学生的内在认同与行动策略。Bourdieu 认为这是一种象征暴力（symbolic violence），即社会将特定文化标准自然化并内化于个体，让技职学生认为自己本就不适合高阶学术场域或主流职业，进而自我排除于资源中心之外（Bourdieu & Passeron, 1990），这种负面自我认同将进一步削弱学生升学动机与向上流动企图心。

然而，研究亦指出技职场域并非全然封闭于阶层复制的结构中，若学校能营造「正向技职文化」，如师生关系信任、成功升学经验分享、实作成就获得认可等，学生的文化资本与职业认同可获得转化与增能（刘祖华、刘丰瑞，2022）。这类「反再制」的教育实践显示制度与文化场域并非铁板一块，仍可透过创新与关系实践实现一定程度的教育公平与阶层转译可能。

综上所述，技职教育场域中的组织政治与文化资本运作，是学生阶级认同与教育选择形成的重要基础。唯有正视与解构技职体系内部与外部的权力交织与文化资本分配不均，才能设计出更具公平性与社会流动性的技职教育制度。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文献分析法（Literature analysis method）为主要研究方法。台湾技职教育的制度演变

与社会认知，是长期累积于政策档、法规条文、官方报告及历年教育改革计划之中。文献分析法适用于整理与诠释这些历史性、政策性文本，藉以厘清技职教育体系中潜藏的制度逻辑、政策取向与文化象征意涵。透过对文献的系统化比较与归纳，可揭示技职体系如何在不同时期响应产业发展、社会阶层流动与教育分流的议题，进而建构出「文凭社会」脉络下的再制机制。

（一）数据源与筛选标准

本研究的主要资料来自政府正式公布之技职教育政策与相关教育发展文献，包括：(1) 教育部及国家发展委员会公布之技职教育法规、白皮书、政策计划与施政报告；(2) 各时期「技职教育再造方案」「产学合作计划」「技术及职业教育法」之相关档；(3) 历年教育统计、年报与评鉴指标档。

此外，为呈现政策演变脉络，亦参考历史性文献，如 1960 年代的类科设置政策、1980 年代能力本位教育及双轨制推动文件等。完整的文献清单整理于附录一之台湾技职教育相关政策文本，表中包含政策主题、内容概述、年代、发布机关与版本信息，作为分析的核心数据源。

为确保分析的系统性与可重现性，本研究依以下标准筛选文献：(1) 纳入准则：包括 a. 中央部会（教育部、国发会等）正式发布，具全国性影响之政策或法规；b. 以正式公告、出版或上网公开之定稿版本为主；c. 涉及技职教育体系定位、课程政策、评鉴制度或资源分配等核心议题；d. 以 2008–2024 年间之文献为主，必要时补充历史重要节点文件以作脉络对照。

（二）数据处理与分析

分析方法采主题分析法（Thematic Analysis），并以 Collins（1979）文凭社会理论所提出之三层次架构为分类准则：(1) 制度层次（Macro-level）：探讨政策文本与法规中，技职教育如何被定位，文凭与学历被如何叙述与评价。(2) 组织层次（Meso-level）：分析学校制度、分流制度与课程设计如何内建阶级再制机制，并反映特定文化资本偏好。(3) 行动者层次（Micro-level）：透过文本中对教师、学生、家长等角色的描绘，理解象征互动如何建构社会认同与教育选择。

资料分析步骤如下：(1) 系统性收集并整理教育部与相关单位公布之官方文件。(2) 针对文件进行开放式编码，归纳出反复出现的语义单元与隐含的价值观。(3) 依 Collins 理论三层面进行分类与诠释，进一步呈现档中如何展演文凭逻辑与教育阶层化。

透过文献分析法，本研究试图建构出台湾技职教育在文凭社会下的制度意义图谱，揭示其作为阶级再制机制的结构条件与象征操作。

（三）研究信效度

为确保研究的信度与效度，本研究采取多元策略以提升分析结果的可信性与可重现性。首先，在数据源方面，研究整合法规条文、公报档、政策白皮书及相关学术研究，透过多元文献的交叉比对以提升资料的一致性与完整性。其次，针对重复修订的政策档，观察政策内容在不同阶段的变化与其制度脉络的演进。此外，研究亦采取三角检证的策略，综合政策文本、教育统计资料与既有学术研究进行交互印证，以确保分析结论的客观性与合理性。最后，为维持研究过程的透明性与再现性，研究于附录中提供完整的文献列表、版本信息及数据搜集路径。

四、结果与讨论

本研究透过对技职政策文件、官方统计资料、评鉴报告与政策评论等大量次级数据的系统性分析，呼应 Collins（1979, 2002）「文凭社会理论」之三层次结构：制度层、组织层与行动者层，整理出台湾技职教育运作中四项具结构性与象征性的主要结果与观察：

（一）文凭通膨与象征意义：台湾技职教育的制度定位与社会认知

在文凭社会中，教育资格的象征功能远大于其实质能力验证功能，成为区分社会阶级的制度化工具（Collins, 1979）。本文分析自 2010 年起教育部推动之「技职教育再造计划」与「技职课纲革新」发现，尽管政策强调技能本位与实作导向，惟在升学导向文化与职场用人习惯未转变之情况下，技职文凭仍被视为次等学历，其象征资本价值远逊于一般大学学历（国家发展委员会，2017；方志华，2023）。

根据教育部（2024）《111 教育统计年报》，技职体系中许多学生在入学后仍持续准备转学考或重考学测、指考，显示进入技职体系并非终点，而是一段通往大学文凭的过渡历程。这样的趋势体现了台湾社会对学历价值的高度依附，并与 Collins 所谓「文凭通膨」现象互相呼应，即社会对于学历的需求不断上升，但学历所代表的实质能力却未必同步提升（Collins, 2002）。

台湾技职教育体系的制度设计历来即服务于经济发展的需求，而非社会平等或教育机会均等的理念。根据教育部（2010）发表的《技职教育再造方案手册》指出，技职体系肩负为产业培育即战力人力之任务，其设计多以响应产业人力缺口为主。但在社会结构面，学历仍主导人力市场的职位分配与阶级排序，技职教育虽有明确职能训练成效，却无法转化为对等的社会象征资本（教育部，2010）。

此外，《第二期技职教育再造计划效益评估报告》亦指出，尽管政府挹注大量资源改善技职教育的设备、师资与课程质量，但整体社会对其学历价值的评价并未明显提升。企业用人仍多倾向以学历高低作为初步筛选依据，专业能力或证照反而被视为次级参考条件。这也说明在台湾社会脉络中，技职教育所产出的文凭未能产生象征性转换效应。

根据林大森（2023）在「台湾 30 年教育改革下技职教育的转向」一文所示，自 1990 年代起的教育改革，包括广设大学与技职体系转型为科大体系，实质上加剧了文凭竞争与学历膨胀现象。原先技专院校的升格虽试图提升学校地位，却也让「升格」成为教育竞争的新象征战场，进一步边缘化尚未升格之技专校院与高职体系。

国际经验亦可左证此一现象。美国自 1980 年以来在推动职业教育时，即面临如何让职教证照被视为等同学术学位的挑战。依据王诞生、林詹田（2014）对美国技职教育的研究，尽管美国透过学分制度衔接与小区大学改革试图提升职业教育之社会形象，但其象征地位仍显不足。台湾的制度挑战与此相似，唯更受东亚地区「升学主义」文化的影响，技职体系难以被视为真正平等的学习路径。

此外，根据方志华（2023）《产学携手计划之成效与问题》指出，多数技职学生即使取得文凭与证照，也因文凭象征力薄弱而难以进入稳定且具晋升可能的职位。这导致学生对技职教育缺乏信任感，进一步造成报名率下降与校系资源分配失衡的恶性循环。

总结而言，台湾技职教育体系在文凭社会中所面临的制度困境不仅来自于制度设计本身，更根源于教育资格象征资本的制度性操控。Collins 指出教育制度已不再是能力认证场域，而是社会阶层区隔与文化正当化机制，这一分析视角协助我们理解技职教育政策无法扭转其「次等教育」形象的根本原因。未来若欲翻转此象征结构，须从社会文化与人力资源政策共同改变学历与实作能力之评价系统，方可能突破文凭通膨与阶级固化的结构困局。

（二）阶级再制的隐性机制：学生社经背景与就学机会

根据教育部《教育统计年报》（2024）与 2023 年各项教育报告数据显示，台湾技职体系的学生大多来自中下社经阶层，包括蓝领工人、农民、原住民族群、新住民及移工家庭子女等（教育部，2024；教育部，2023）。在地理分布上，中南部与花东地区的学生进入技高与科技大学的比例，明显高于双北与台中等都会区，其背后隐含着明确的区域与阶级分布结构。学生的教育选择受到家庭财务能力、学区资源不均与文化资本的制约，使得技职体系常成为这些学生「次佳选择」甚至「唯一选项」（王诞生和林詹田，2014；黄毅志，2011）。

Bourdieu 与 Passeron（1990）指出，教育制度具有维护既有阶级结构的隐性功能，学校场域会以

支配阶级的文化资本作为评价标准，造成中下阶层学生的「文化不适性」，从而被排除于菁英教育的竞争场域之外。台湾的教育分流制度正体现此一机制，国中毕业生必须在年龄尚小、资源尚不对等的条件下做出升学抉择，成绩未达门槛者被制度性地引导至技职体系，在象征上即已落居「次等教育」位置（林大森，2002；陈恒钧、许曼慧，2015）。

进一步而言，《2017年技职教育学用落差问题研析报告》指出，技职体系学生的就业结果与原生家庭背景之间高度相关。多数技职生虽接受职能导向训练，但毕业后大多投入低附加价值之制造或服务产业，缺乏向上社会流动的阶梯。此外，技职体系转学至一般大学门槛高、补习资源少，使得缺乏社会资本的学生难以透过升学改变社经位置，形塑出「技职进路=社会固化」的认知模式（国家发展委员会，2017；张瑞雄，2018）。Collins（1979）对文凭社会的批判正可援引于此情境。他认为文凭制度已转变为象征阶级地位的筛选工具，而非实质能力的认证标准。台湾教育部虽在《技术及职业教育 政策纲领》中宣称要实现「技职与普通教育等值而非等级」（教育部，2023），但实际上社会对两者价值的判断依然明显偏颇，升学文化依旧强势支配家长与学生的选择行为（方志华，2023）。

根据《产学携手合作计划之成效与问题》调查，尽管政府鼓励企业与学校合作设立「产业专班」与「人才培养菁英计划」，但由于企业招聘仍多以学历为初级筛选标准，技职生即使拥有证照与实作经历，仍常面临就业歧视与晋升瓶颈（教育部，2019）。此与德国双轨制相比显得格外薄弱，德国企业对职能认证制度具有高度信任，并设有明确的生涯发展制度，而台湾则普遍缺乏具制度性支持的生涯晋升与证照转换机制。再者，《第二期技职教育再造计划效益评估报告》明确指出，尽管政府挹注资源改善设施设备与教学质量，社会大众对技职教育的负面刻板印象仍未消弭。报告中多数受访学生表示，他们将技职进路视为升学失利后的「补救策略」，并无法对未来就业产生信心，也缺乏长远的生涯规划（国家发展委员会，2017）。此现象与所谓「相对剥夺感」（relative risk aversion）机制相符，即家庭会采取各种策略以避免社会地位下降，而技职教育恰好成为多数家庭不得不接受的「次优选项」（张宜君、林宗弘，2015；林凯衡、陈俊宏，2018）。

此外，《台湾与他国技职教育之探讨》指出，与德国双轨制相比，台湾技职体系较缺乏产业端的深度参与与生涯升迁机制，使技职文凭与工作发展缺乏连结性，间接削弱其社会向上流动的功能。美国的小区大学与生涯技术教育也面临相似困境，然而其较具弹性之跨轨学制仍提供了部分流动性；相较之下，台湾现行的分轨升学与学用分离结构，更加深了教育与阶级之间的连动（阙凡、郭金国，2022）。

因此，技职教育在现行制度安排下，已从「能力导向的教育机制」转化为「阶级分类的社会机器」。尽管政策强调多元入学、技能本位与实务训练，然而在社会现实中，文化资本、象征资本与家庭背景交织成为限制学生流动的「隐性结构」。教育资源的地理分布、师资差异、升学途径与就业机会等因素构成重重障碍，使中下阶层学生难以翻转其原生社会位置。

总结而言，台湾技职体系虽名义上提供「多元升学与职能导向」选项，实则强化了社会阶级再制的结构安排。Collins的理论及Bourdieu的教育场域观点，均提供了揭露这一现象的理论工具，也说明教育本身在符号与结构层面所扮演的再制角色。要突破此困境，未来不仅需技职政策的转向，更需整体社会对学历价值的再思，方能使技职教育真正成为实现教育正义与社会流动的可能场域。

（三）组织文化与资源分配：技职学校内部政治与文化资本

Collins（2002）进一步在其研究中指出，学校并非单纯的知识传递场域，而是权力、象征与文化资本互动的权力场。学校内部的组织文化与资源分配不仅塑造学生的学习经验，也深刻影响教育制度再制阶级与认同的方式。台湾技职学校在面对教育部的评鉴压力与经费分配制度下，形成一种导向绩效导向的文化，而非以学生发展为核心的教育价值体系。

分析《技职教育再造方案手册》与《第二期技职教育再造计划内涵》可见，政策设计虽强调「产学合作」、「课程革新」与「实务导向」，但评鉴与补助标准仍集中于量化绩效指标，如升学率、就业

率、证照取得率等。这种绩效导向的组织逻辑，使技职教育机构在实务运作上更倾向资源集中分配于可产出高绩效成果的学生与科系（教育部, 2010 & 2013）。

根据《第二期技职教育再造计划效益评估报告》显示，技职院校为了争取教育部补助资源，常将资源集中投注在「明星科系」、「绩优学生」与「亮点成果」的营造，而忽视一般学生或文化资本相对贫乏学生的支持系统。例如，许多技术学院设置「菁英班」或「顶尖产学合作专班」，由行政资源全力支持，并作为评鉴指针与外部形象工程的展示对象。相较之下，弱势学生群体在制度资源中的可见性与发展性则被边缘化。

这样的资源分配方式，正如 Bourdieu 所言，学校制度并未颠覆主流文化资本的分配逻辑，反而内化主流价值，透过形式化指针将教育转化为资本再制的机制（Bourdieu & Passeron, 1990）。技职学校虽名为「职能导向教育机构」，但其组织文化已被主流的学历价值与评鉴机制同化，使得学校内部运作更像是一种象征性的绩效展演空间，而非培育多元人才的教育场域。

更进一步，根据《我国技职教育发展及近年重大计划办理成效之检讨》中的资料，部分技专院校即便设立产学合作课程或办理「产业菁英班」，仍存在学生实习与企业实际需求脱节的问题。产学合作常流于形式，教师评量亦倾向以行政绩效为指标，例如企业参与次数、成果发表会数量等，而非评估学生学习转化与实务能力成效。

林大森（2023）亦指出，技职学校的行政结构与经费制度使得校务运作逐渐转向绩效中心主义。学校领导者为了确保评鉴成绩与补助资源，普遍倾向优先配置资源于易出绩效的计划与人员，而非建立支持弱势学生发展的制度结构，造成技职教育「补偿性功能」的结构性弱化。

此外，在技职教育现场的课程安排上，为配合各项评鉴指标，教师教学自由度受到限制，标准化课程与模块化训练内容成为主流。这样的教学文化限制了教师针对不同学生需求进行差异化教学的空间，也压缩了学生在技术与创意实作上的多元性发展空间。

从组织文化层面观之，技职学校教师、行政与家长等行动者共同参与资源的分配与价值的建构。他们往往根据评鉴指标设定学生的「可投资性」与「发展潜力」，而学生在学习历程中也会逐渐内化这套价值标准，进一步影响其学习动机与自我认同。来自弱势家庭的学生若未获得制度性支持，很容易被标签为「成就预期低」、「竞争力不足」，进而导致教育选择与职涯发展更为保守与受限。

综合而言，台湾技职教育体系内部的资源分配与组织逻辑，并未能打破阶级与文化资本再制的格局，反而在绩效导向的制度运作中深化了教育不平等的结构。Collins 的教育象征互动与权力场观点提醒我们，技职教育若不能挑战既有的文化资本逻辑与绩效迷思，将难以发挥其阶级翻转与教育正义的功能。未来应重新检讨技职教育的评鉴机制与补助制度，将焦点回归于学生的多元发展与社会公平性建构，方能实践技职教育的核心价值。

（四）教育选择与身分认同：技职体系学生的认知与未来预期

教育制度除了制度性地再制阶级差异之外，也透过象征互动与认同形塑的过程，建构个体对自我社会位置的理解（Collins, 1979）。在台湾技职教育体系中，学生往往并非基于职涯规划或技术志向而选择技职学校，而是因升学竞争落败或家庭背景限制，被动地进入此体系。根据《产学携手计划之成效和问题》所进行的调查显示，多数技职学生坦言选择技职体系是「考试失利后的次佳选择」，他们对未来职涯方向缺乏清晰规划，并对自身所拥有的学历与文凭感到焦虑与不安（方志华, 2023）。

这种以「替代性选项」为前提的教育选择，强化了技职学生对自我身分的负面认同。学生普遍认为自己处于社会结构的边缘，其受教育的过程并非为实现兴趣或技术专长，而是一种被迫适应结构性不利的策略选择。这种现象可被视为 Collins 理论中「认同型阶层再制」的具体展现，即学生在教育历程中不仅被分类为低阶层学历群体，也在心理层面内化这种低位阶的象征意义。

进一步分析教育部推动的「产学携手合作计划」，虽然政策强调企业介入课程设计与职场导入，但实际操作上，企业对技职学生的文化背景与学习习惯缺乏认识，课程设计多流于标准化与实用技术导向，未能真正触及学生的价值观养成与职涯认同建立。合作过程中，企业多以「配合评鉴」为导向，而非长期投资学生未来发展。这样的短期策略使学生未能获得持续性的工作认同与信心建构。

此外，林大森（2023）指出，学生对技职教育的未来发展普遍缺乏信心，多数技职生期望透过转学、考试进入一般大学或研究所体系，以获得社会上更被认可的学历象征。这样的升学偏好，进一步说明了文凭象征意义凌驾于实务技能之上的社会文化态度。也显示即使学生已在技职体系中学习，其教育认同仍停留在「通往学术体系的过渡阶段」，而非真正认同技职本位。

在象征层次上，根据 Bourdieu（1984）的文化资本概念，学生之所以追求主流教育体系认同，正是因为社会场域中对「正统学历」的象征价值与文化认可，使得技职文凭与职能技能长期处于文化资本的弱势地位。学生进入技职体系，往往承受家庭与社会环境对其学历的负面评价，甚至被贴上「考不好才去技职」的标签。在缺乏正向社会象征的教育环境中，学生很难在教育历程中获得正向的身分建构。

从教师与学校层面观察，《第二期技职教育再造计划效益评估报告》指出，技职学校教师普遍将「升学成绩」、「证照通过率」作为教学成效指标，这种对外部绩效的强调，使教师教学文化偏重应试与标准化训练，忽略了学生认同、价值观建构与职涯探索等发展性课题。教师与行政体系多半也默认「技职学生认真读书应努力考学士班」这种价值，间接再现「学术本位」文化逻辑，导致学生在潜意识中否定自身教育选择。

此外，「美国技职教育的发展与启示」一文也提到，美国透过小区学院（Community College）制度，强化技职学生的职涯导向与文化认同培育，其核心在于以「赋能」与「参与」取代「补偿」与「歧视」（林诞生、林詹田，2014）。相较之下，台湾技职体系缺乏这类支持性文化与制度设计，反而不断强化升学焦虑与学历竞逐，使学生难以建立技术工作者的社会价值认同。

综合上述观察可知，台湾技职体系学生在教育选择与身分建构过程中，面临双重认同压力：一方面来自社会文化对技职教育的负面标签，一方面来自教育制度内部评鉴与升学导向的再制效应。Collins 对于教育制度象征性阶层再制的批判，在此获得充分验证。若台湾技职教育欲实践真正的教育公平与社会流动功能，必须从文化与制度两个层面入手，重构技职教育的正向象征意义，建立可被认同的教育身份认同架构，并透过多元就业支持与赋能课程设计，协助学生建构积极的未来职涯预期。

五、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从 Randall Collins 的「文凭社会理论」出发，结合 Bourdieu 的文化资本与再制理论，透过次级资料与政策文献分析，批判性检视台湾技职教育体系在当代社会中的制度定位与功能变迁。研究归纳以下四点主要发现：

1. 技职教育沦为象征性阶级分类工具

尽管教育部自 2008 年起陆续推动「技职教育再造计划」、「技职课纲革新」与各项产学合作政策，试图提升技职教育的社会价值与就业导向，然而本研究发现，在「文凭主义」与「升学主义」文化主导的社会场域中，技职文凭的象征性资本仍明显弱于一般大学文凭，难以实质改变既有的社会认知。学生与家庭普遍将技职体系视为「不得已的替代选项」，并持续投入重考、转学考等学历翻转行动，进一步再现 Collins 所批判之「文凭通膨」现象。

2. 技职体系强化社经阶层再制机制

依据教育部（2023, 2024）统计资料，技职体系学生以中下阶层与非都会地区为主，其教育选择受限於地理资源、文化资本与升学制度安排。Bourdieu 与 Passeron（1990）所揭示的「合法不平等」在台湾技职体系中具体体现：虽然制度表面上提供多元入学机会，实则分流制度预设不同阶层学生的教育命运，使得技职教育成为阶级再制的隐性机制，抑制下层阶级实现向上流动的可能性。

3. 组织运作内化主流价值评鉴逻辑

在高压评鉴制度与资源竞争下，多数技职学校将重点资源集中于明星科系、升学绩优者与证照通过率等可量化绩效项目，忽略对一般学生或文化资本较弱群体的支持性设计。Bourdieu（1990）认为教育机构若内化主流价值标准，将不再是阶级流动的管道，而是再制现有社会结构的文化装置。本研究证实，技职教育体系虽表面强调职能本位，实则运作逻辑早已被主流的学历逻辑与绩效迷思所渗透，导致其「补偿性功能」遭到削弱。

4. 学生认同困境与未来预期焦虑并存

多数技职学生对其教育选择缺乏主体性与正当性认同，将就读技职视为升学失败后的替代路径，并对未来生涯发展感到不确定与焦虑。教育政策虽积极推动产学合作，但未能真正赋能学生，技职身分仍深陷社会象征的负面标签困境。

综合以上发现，台湾技职教育体系虽具备实务导向与培育应用人才的潜能，但在长期文凭社会的象征结构中，技职教育反而被制度化成为阶级划分的工具，未能有效实现教育正义与社会流动目标。Collins 对教育制度「象征性阶层再制」的批判，以及 Bourdieu 对教育场域文化资本运作逻辑的揭示，均协助本研究透视技职教育无法翻转阶级结构的根本原因。唯有从制度设计、文化认同与资源分配等多重层面同步进行结构性改革，方能真正赋予技职教育正当性与公平性，使其成为弱势学生向上流动的可行路径，而非阶级固化的再制机制。

（二）政策建议

1. 重建技职教育的正向象征意义与社会认同

技职教育应脱离长期以来「补救性选项」与「次等教育」的社会标签，重新建构具正向象征意涵的教育话语体系。教育主管机关可透过与媒体、公民社会与企业协作，发展长期性的公共沟通策略，例如设立技职国家人才库、技术工作者相关纪实节目等，让社会大众看见技职人才的价值与贡献。文化再现策略必须导向对「技术劳动的尊严」与「多元价值的尊重」，以扭转单一学历阶层的认知框架。

2. 修正评鉴制度与资源分配逻辑

当前技职教育评鉴过度依赖升学率与证照取得率等量化资料，导致学校资源与课程设计偏离学生本位与多元发展。建议教育部修订相关评鉴指标，纳入学生学习历程成长、生涯发展满意度、创意实作成果、在地服务参与等质性项目，并设计支持文化资本较弱学生的奖补助与指标加权制度，确保评鉴制度真正响应教育公平与多元价值。

3. 深化与在地产业合作，建构多元流动通道

技职教育若要突破升学主义主导的结构性困境，须从在地经济生态出发，强化与中小企业、地方产业、职业工会、非营利组织的合作关系，发展具区域劳动市场适应性的课程模块与职场实习制度。建议推动「区域技术合作平台」，使技职学生在地就学即能在地就业，降低升学焦虑，重构生涯想象空间与未来可能性。

4. 强化技职学生身分建构与生涯辅导支持

在组织运作与教学实践层面，应设立支持技职学生的专责单位，如生涯发展中心、认同建构课程、文化转化辅导小组等，透过教师引导与校内文化重建工程，协助学生重构对技术职业的自我认同。同时，培养具社会关怀与文化敏感度的导师系统，将生涯发展与生命教育结合，避免学生在教育历程中陷入象征性贬抑与心理疏离的困境。

（三）未来研究建议

未来的研究可进一步建立技职体系学生的横断与纵贯性数据库，持续追踪其从入学、学习、毕业到就业的完整教育历程，并探讨其生涯转化经验与社会流动样态。透过这类追踪研究，可以更深入理解技职学生如何在制度、文化与家庭资源交织的情境下建构教育认同与阶级位置，并分析教育政策在个体生命历程中的实质影响。

此外，面对全球教育制度日益交互借用的趋势，建议未来研究采比较教育的视角，探讨东亚与欧美国家技职教育制度之差异与移植的可能性。例如，德国、日本与美国的技职体系在双轨制设计、学用整合、社会认同建构等方面各具特色，台湾在制度借鉴时如何因应在地文化、产业结构与教育传统的适配问题，值得深入分析与评估其可行性与风险。

最后，建议未来研究聚焦技职体系中不同弱势群体的教育经验与社会处境。尽管本研究已指出中下阶层学生在技职教育中面临阶级再制风险，但对于如新住民子女、原住民族、低收入户家庭子女等群体，其在教育选择、身分认同与制度经验上可能存在更多差异化与不平等。未来可透过田野调查、叙事分析与族群比较，丰富技职教育公平性与正义性的理论基础与政策回应。

参考文献

- 陈恒钧、许曼慧（2015）。台湾技职教育政策变迁因素之探讨：渐进转型观点。公共行政学报，48，1-42。
- 陈美姿、宋修德（2024）。技职教育群科设置的未来趋势。台湾教育评论月刊，13（7），5-10。
- 陈易芬、翁福元、廖昌珩（2015）。技职学术化：当前台湾技职教育改革政策的反省。台湾教育评论月刊，4（11），42-46。
- 方志华（主编）（2023）。台湾教育评论月刊：产学携手计划之成效与问题。台湾教育评论月刊，12（5），1-198。
- 国家发展委员会（2017）。第二期技职教育再造计划效益评估报告。国家发展委员会。
- 何美瑶（2005）。台湾的技职教育。学校行政双月刊，35，129-144。
- 黄松浪（2013）。从文化承袭探讨家庭资本对技职学生之教育影响。嘉南学报，39，320-333。
- 黄政杰（2015）。技职教育学术化的问题与对策。台湾教育评论月刊，4（11），1-6。
- 黄铭福、黄毅志（2014）。台湾地区出身背景、国中学业成绩与高中阶段教育分流之关联。教育实践与研究，27（2），67-98。
- 黄毅志（2011）。台湾的教育分流、劳力市场阶层结构与地位取得。心理出版社。
- 黄骏（2001）。文化之政治经济学、组织政治与身分群体—Collins 论文凭社会及韦伯理论之关系。教育研究集刊，1（46），107-124。
- 教育部（2010）。技职教育再造方案手册。教育部。
- 教育部（2013）。第二期技职教育再造计划内涵。教育部。
- 教育部（2019a）。我国技职教育发展及近年重大计划办理成效之检讨。教育部。

- 教育部 (2019b)。技术与职业教育法。https://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1405
- 教育部 (2023)。技术及职业教育政策纲领。教育部。
- 教育部 (2024)。教育年报。教育部。
- 技术及职业教育司 (2017)。技职教育务实再造—产学合作紧密连结。
https://www.edu.tw/News_Content.aspx?n=9E7AC85F1954DDA8&s=31D5E8AAE632E4E8
- 李敦仁 (2007)。人力资本、财务资本、社会资本与教育成就关联性之研究：Coleman 家庭资源理论模式之验证。教育与心理研究, 30 (3), 111-141。
- 李高英 (2017)。技职教育学用落差问题研析。立法院。
- 李隆盛、李懿芳、张维容 (2020)。我国技职教育课题与政策之重要性评估。台湾教育研究期刊, 1 (2), 13-28。
- 林大森 (2002)。高中 / 高职的公立 / 私立分流对地位取得之影响。教育与心理研究, 25 (1), 35-62。
- 林大森 (2023)。台湾 30 年教育改革下技职教育的转向。教育研究集刊, 69 (4), 41-86。
- 林宗弘 (2009)。台湾的后工业化：阶级结构的转型与社会不平等, 1992-2007。台湾社会学刊, 43, 93-158。
- 林凯衡、陈俊宏 (2018)。迈向民主化的技职教育？与民间教育改革人本主义的对话。台湾教育社会学研究, 18 (2), 45-87。
- 刘祖华、刘丰瑞 (2022)。多元技职教育的挑战与发展。台湾教育评论月刊, 11 (5), 1-10。
- 阙凡、郭金国 (2022)。台湾与他国技职教育之探讨。台湾教育评论月刊, 11 (7), 122-129。
- 王诞生、林詹田 (2014)。美国技职教育的发展及启示。教育数据集刊, 63, 29-54。
- 吴佩玲、劉一慧、羅希哲、孟祥仁 (2007)。社会变迁对我技职教育冲击之研究。建国科大学报, 26 (3), 1-18。
- 徐昊杲、林逸栋 (2015)。破除高等技职教育普通化、学术化之迷思。台湾教育评论月刊, 4 (11), 53-56。
- 杨朝祥 (2007)。台湾技职教育变革与经济发展。财团法人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
- 张宜君、林宗弘 (2015)。台湾的高等教育扩张与阶级复制：混合效应继续的不平等。台湾教育社会学研究, 15 (2), 85-129。
- 张训译 (2019)。技职教育与产业接轨之问题与建议。台湾教育评论月刊, 8 (1), 95-97。
- 张瑞雄 (2018)。技职教育之未来。师友双月刊, 608, 001-5。
- Bourdieu, P. (1984).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 Routledge & Kegan Paul, London.
- Bourdieu, P., & Passeron, J. C. (1990). *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 (2nd ed.) (R. Nice, Trans.). Sage Publications, Inc.
- Bowen, G. A. (2009). Document analysis as a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Qualitative Research Journal*, 9 (2), 27-40.
- Brown, P., Lauder, H., & Ashton, D. (2011). *The global auction: The broken promises of education, jobs, and*

incom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ollins, R. (1979). *The Credential Society: An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Education and Stratification*. Academic Press.

Collins, R. (2002). Credential inflation and the future of universities. In S. Brint (Ed.), *The future of the city of intellect: The changing American university*, (pp. 23-46).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havit, Y., & Müller, W. (2000). Vocational secondary education: Where divergent pathways lead to social inequality. *European Societies*, 2(1), 29-50.

作者介绍

蔡富滇，博士，台北教育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经营学系&台北商业大学创新设计与经营研究所，助理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产业与文化政策、地方创生、商品设计与开发等。目前再攻读第二个博士学位，于国立台北教育大学教育经营与管理学系，主要研究方向为技职教育、教育政策、教育领导与行政等。